

C h e n g z h e n T i x i g u i h u a

城镇体系规划

新理念 · 新范式 · 新实践

邹 军
张京祥
胡丽娅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城镇体系规划

新理念 新范式 新实践

邹 军 张京祥 胡丽娅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实践和科研的最新成果,对城镇体系规划的新理念、模式等进行系统而具体地阐述,内容包括城镇体系规划的基本理念、重点、内容与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化战略、城镇体系结构与组织规划、生态环境及支撑系统规划、分区管治与协调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类型的新发展、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机制与制度创新、国外区域规划的编制及实施管理等进行分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体系规划:新理念·新范式·新实践/邹军,张京祥,胡丽娅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81089-001-8

I. 城... II. ①邹... ②张... ③胡... III. 城镇—城市规划 IV. 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944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8.5 彩插 2 字数:30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 000 册

定价:26.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发行科调换。电话:025-3792327)

前 言

城镇体系是建构在区域经济、社会运动背景中的空间组织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与投影。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引进国外城镇体系的相关概念后，针对具体的国情、区情进行了大量深入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及规划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形成了城镇体系组织结构理论成果和《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成为区域空间组织的基本技术与法定依据，以及其它层次空间规划的指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市场化制度的建立，我国进入社会经济较快发展、结构深刻转型的新时期，特别是在目前全国省域和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广泛开展的形势下，城镇体系的研究和规划面临着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紧迫要求。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不能囿于传统的理论范式与规划的概念模式，而要强化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化趋势、合理组合模式、结构优化调整和前瞻性预测的科学研究。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行为在城镇体系规划及实施机制中的重要性、规划环节的协调及体制环境的转变对城市

化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建立健全实施管理机制等应在城镇体系规划中充分体现。

从1998年开始,本书作者利用参与编制一批省、市、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或其它相关类型规划的机遇,结合教学、科研,对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进行了初步探讨,编成此书,以就教于大家。全书正文共9章,编写分工为:第一章张京祥,第二章邹军、张京祥,第三章胡丽娅,第四章邹军,第五章胡丽娅,第六章邹军,第七章张京祥、邹军,第八章邹军,第九章张京祥,全书由邹军统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著名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崔功豪教授和南京大学、建设部、江苏省建设厅、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专家、领导、同事、学友的指导和关心,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著者

2002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城镇体系研究与规划实践历程回顾	(1)
第一节 国外城镇体系研究及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及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	(6)
第三节 城镇体系规划与区域规划的再兴	(11)
第二章 城镇体系规划的基本理念、重点、内容 与方法	(21)
第一节 城镇体系规划的定位	(21)
第二节 城镇体系规划的基本理念	(22)
第三节 城镇体系规划的重点、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28)
第三章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化战略	(32)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2)
第二节 城市化战略	(50)
第四章 城镇体系结构与组织规划	(81)
第一节 概述	(81)
第二节 城镇体系结构与组织规划的基础和依据	(84)
第五章 生态环境及支撑系统规划	(143)
第一节 生态环境规划	(143)

第二节	支撑系统规划	(158)
第六章	分区分治与协调规划	(172)
第一节	分区分治协调的含义	(172)
第二节	分区分治与协调规划的方法	(173)
第七章	城镇体系规划类型的新发展	(181)
第一节	都市圈规划	(181)
第二节	城乡一体化规划	(205)
第三节	概念规划	(213)
第八章	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机制与制度创新	(232)
第九章	国外区域规划的编制及实施管理	(237)
第一节	政治经济体制与区域规划总体模式	(237)
第二节	国外区域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	(244)
第三节	国外区域规划的实施管理	(249)
附录	城镇体系规划的相关政策法规	(260)
参考文献		(286)

第一章 城镇体系研究与规划 实践历程回顾

第一节 国外城镇体系研究及区域 规划的发展历程

城市规划学与城市地理学研究城市有两个基本的视角:一是将城市看作一个面,研究个体的发展演变规律;二是将城市视作区域中的一个点,研究一定系统中的群体发展,城镇体系研究即属于此范畴。人类关于城市研究的总体趋势过程是由个体走向群体,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认识逐步深化、视野不断拓宽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研究提出的持续性要求,中西方概莫能外。

一、源起时期

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逐步引发了西方城市社会经济领域和空间组织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工业生产逐步占据了城市的主导功能,大规模的迅速城市化导致了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日益恶化,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城市的集聚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之间的平衡状态,在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广大非城市地区则因投资布局的过分向城市倾斜以及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出而日趋落后,导致严重的区域发展两极分化。人们在致力于城市内部改造与物质环境改良的同时,不得不把目光越过单个城市而投射到城市以外的区域(“城市的希望在于城市之外”,L. 芒福德),探寻城镇群体发展的整合与优化,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同时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城镇体系具有很强的整体功能和有效的外向连带功能,是一种区域内城镇群体发展的组织形式。

最早从城镇群体(Town Cluster)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与实践,并提出城镇体系概念雏形的是英国学者霍华德(E. Howard, 1898)。他提出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模式建议以围绕大城市的分散、独立、

自足的田园城市解决大城市的矛盾,以达到高度的城市生活与清静的乡村生活的有机结合,强调把城市和区域作为整体研究的思想。其后霍氏的模式被恩温(R. Unwin, 1922)进一步发展为“卫星城”理论,而广泛付诸于大城市调整重组的实践。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 Geddes)则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的方法,1915年发表了著名的《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强调将自然区域作为规划的基本构架,分析区域的潜力和容量的限度对城镇发展的影响,成为在工作方法上使西方城市科学从分散和互不关联走向综合的奠基人,并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新的群体形态:城市地区(City Region)、集合城市(Conurbation),甚至世界城市(World City)。1918年规划师沙里宁(B. Saarinen)以“有机疏散”理论模式拟定了著名的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这一时期西方许多大城市(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柏林等)的规划、研究都已拓展到区域—城镇群体层次。

在进行大量规划实践性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则在本学科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理论工作。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第一次把区域内的城镇系统化。他对城镇体系作了严谨的论述与数理分析,提出了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模式,被后人公认为城镇体系研究的基础理论(1977年G. W. Skinner曾运用它对中国四川盆地的城镇体系进行了研究)。1939年杰弗逊(M. Jefferson)及1942年哲夫(Zipf)等对城镇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理论研究。

二、发展时期

二战以后,随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普及,城市问题、城市—区域问题更趋尖锐、繁杂,而所有这些矛盾的激化越发体现出从城镇群体角度研究城市、研究区域的重要性与必然性。随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分散城市化阶段而导致了大都市区范围的进一步扩展,以过疏、过密形式为特征的区域不平衡状况加剧,进一步对城镇体系提出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要求。在这个时期内,城镇体系的理论框架逐渐确立并完善。

1945~1955年,维宁(R. Vining)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城镇体系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从理论上论证了城镇体系的合理性。

1960年邓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和区域》中首先明确提

出“城镇体系 (Urban System)”一词,并阐明了城镇体系研究的实际意义。

1964年贝里(B. Berry)用系统化的观点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等级体系的关系,把城市地理学研究与一般的系统论相结合,开创了城镇体系研究的新纪元。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新的城市区域概念,如弗里德曼(J. Friedmann)与米勒(J. Miller)的“城市场(Urban Field)”,福克斯(K. A. Fox)和库马(T. K. Kumar)的“功能经济区域(Functional Economic Area)”,拓宽了城镇体系的研究领域。还有一些学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镇体系进行了探讨。

社会经济学家研究城市—区域关系及城镇体系的演化发展机制则另辟蹊径,大量涉及区域发展的理论纷芸众出。赫希曼(A. 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 W. Rostow, 1960)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J. Friedmann)及阿隆索(Alonso)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体系形成运作过程、佩鲁(F. Perroux, 1955)的“增长极理论”等等都早已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熊彼得(J. Schumpeter, 1912, 1939)“创新(Innovation)”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提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阶段的对应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莫里尔(R. Morill)进一步分析了创新扩散的具体特征。从某种程度而言,前面一些发展理论只是空间扩散学说的具体化。包括空间扩散学说在内的这些发展理论普遍认为:区域城镇群体的发展将会因为扩散效应而由极化的不均衡最终走向均衡,而当今新全球经济分工导致的“核心—边缘”效应加剧则对之提出了挑战,这将在后文中论述到。

三、研究高潮与转折时期

到了20世纪70年代,城镇体系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研究报道大量涌现,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以计算机为支撑的数学方法、动态模拟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代表性的工作如1977年哈格特(P. Haggett)从Interaction、Network、Nodes、Hierarchies、Sur-

faces、Diffusion 等六个角度研究区域城镇体系运作的过程。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以分散为主的城市郊区化阶段,城市发展基本进入稳定期。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者认为城镇体系理论已经基本成熟,因此大多著书立说对之予以总结,最著名的有美国学者贝里(B. Berry)和豪顿(F. Horton)的《城镇体系的地理学透视》(1970),以及加拿大学者鲍恩(L. Bourne)和西蒙斯(J. Simmons)的《城镇体系:结构发展与政策》(1978)。

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大城市高度集聚、城乡差别明显、城镇间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日渐显著,组织一个区域内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迫切要求,亦成为西方学者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城镇体系的研究重点遂转向发展中国家。

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虽然在城镇体系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着区域规划传统和具备较强国家干预能力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波兰等,都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城镇体系规划实践工作。而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北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则几乎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次,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在内的区域规划工作都遭到了根本的否定。如历史上著名的田纳西河综合开发治理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美国政府却因为担心由此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中央权力的无限增加而削弱地方自治,从此再也没有效仿。

从 20 世纪 30 年代 W. 克里斯泰勒提出中心地理论起,西方国家城镇体系研究方向和重点在不断变化。总体而言,已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加入了时间序列概念,建立数学模型,注意城市要素的空间运动过程;从结构研究转向机制研究,由探讨城镇体系的空间组合形式,转为探索发展变化的动因;从系统的机制研究转向系统的调控研究,寻求优化结构,开展对策研究,以求为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

四、最新进展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进入了后工业社会(Post - Industrial Society)。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管理的高层次集

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方式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Information Economy Society)、知识经济社会(Knowledge Economy Society)的总体特征。城市作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空间载体,城镇体系也由此呈现出了深刻与全新的景象。

过去有关城镇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或国家范围内,但在当代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要求人们必须从全球的视野认识城市化过程和城镇体系形成机制及组织结构。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开始了对诸如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网络城市(Network Cities)、世界城市体系(World Urban System)之类的崭新研究。经济全球化使城镇体系内城镇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城镇体系的地理界线扩展到了国家界线以外,位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城市共同组成全球城市网络体系。英国学者霍尔(P. Hall)早在1966年便提出了基于新型全球经济重组背景下而产生的一些“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描述了其政治、经济、社会、信息、文化等方面的特征。沃夫(Wolff, 1982)、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2, 1985, 1993)、莫斯(Moss, 1987)、萨森(Sassen, 1991)等人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对世界城市体系进行了分级。法国的瑞克鲁报告(1989)及萨奇(Shachar, 1994)对世界城市的特征与功能作了界定。典型的研究成果还有萨森(Sassen, 1995)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及史密斯(Smith)和泰姆布莱克(Timberlake, 1995)对世界城市体系图景的描述。

信息网和航空网成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新途径。卡斯泰勒(Castells, 1994)认为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 Cities)即全球城市,并且据此建立了按新全球秩序进行分级的世界城市体系。史密斯(Smith, 1995)则按航线旅客数据重建了世界城市体系的等级系统。城镇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些高效的基础设施走廊将知识密集中心和大都市联系在一起,形成“走廊式城市(Corridor Cities)”结构,城镇体系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形成新兴的“网络城市”。

当今的城镇体系组织结构正在由网络取代传统的城镇体系的等级概念。城镇的等级、层次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也取决于其作为复合网络(信息网、金融网等)连结点的作用。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组织与人士曾寄希望于哈格斯特朗的空间扩散学说,期待世界、区域发展的逐渐均衡。而20世纪80年代以

后的发展事实表明,西方国家迅速在直接关系人类发展未来的众多新兴领域(金融、科技、信息等)确立了无可动摇的地位,在发展层次与水平上将发展中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虽然他们之间在经济、生活水平上的绝对差距有逐渐持平的可能,但在发展的层次上距离将会越来越大(Bronsdier, 1985, Wimberley & Bello, 1992)。沃尔斯汀(Wallerstein, 1974)认为世界具有核心—边缘劳动分工的特征,形成核心国(Core Country)和边缘国(Periphery Countries)间关系日益明显的不对称结构,从而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跨国公司成为这种不平等经济交往的重要机构(Chase Dunn, 1989)。美国学者克鲁格曼(1979)的“技术差距论”坦率地指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其地位,必须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这种发展无论愿意与否,则将所有的城镇都联系在一起。这些现象都给城市发展理论及城镇体系研究、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二节 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及区域 规划的发展历程

一、总体历程

总体而言,中国城镇体系研究开展得较迟。但早在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梁思成先生就曾在重庆《大公报》上撰写《市镇体系秩序》一文,在介绍西方学说的同时,预见性地指出中国将进入工业化时代城镇快速发育的“青春时期”,呼吁在中国“预先计划、善于辅导,使城镇发展为秩序的组织体”。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这一科学愿望终成泡影。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严重敏, 1964)首次译介了W. 克里斯特勒的《城市的系统》一文,但其后国内并未开展相应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恢复、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对规划思想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城市发展的区域分析,城镇体系的概念进一步推广普及。197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and 高校,承担了国家城建总局(现建设部)委托的多种类型城镇体系的研究工作,是为我国普遍进行城镇体系研究与实践工作之始。

1982年中国引入国外的“国土规划理论”,开始了由点及面,普及

到全国各级行政区域(省、市、专区、县),以资源开发、生产力布局和环境整治为中心的国土规划工作,城镇作为生产力布局的空间载体,是国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城镇体系规划便在不同层次行政区开展起来。1984年以后,我国开始广泛推行“市带县”的行政体制,各地政府迫切要求为一个区域内相互联系的一组城镇的合理发展提供宏观的指导。我国城市工作者以城镇体系规划扩大了城市规划的内涵,把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联结起来。其后城镇体系规划一直与区域规划、国土规划及以中心城市为主的经济区建设等各项工作密切结合。

城镇体系规划的重要性日益被得以重视,在1984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条例》中,明确规定把布置城镇体系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一部分。1989年颁布的《城市规划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分别编制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规划的编制”(第11条);“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第14条)。此举大大推动了市域、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的开展。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和城镇群体化发展的新特征,1998年建设部又对完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城镇体系规划已经被纳入我国城市规划的编制体系中,具有了法定的效力,在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有了良好的开端。

我国城镇体系的研究工作最早是在城市地理学界开展起来的(宋家泰,1978;许学强,1982;严重敏,1985;周一星,1986;崔功豪,1987;杨吾扬,1987等),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都较早地设立了区域与城市规划专业,对我国城镇体系研究的开展和规划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随后城镇体系研究得到了包括规划界、经济学界在内的多学科领域的共同参与,相互交汇融合,并直接服务于区域开发和城市发展,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二、主要研究与实践领域

20年来,中国城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镇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着重从城市与区域(乡村)、城镇之间的各种关系上,包括位置、等级、规模、功能、联系等等定义城镇体系,并强调群体的作用。对城镇体系特点的探讨,主要是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强调城镇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有序性、动态性特点(宁越敏)。有学者从非平衡系统角度探讨了城镇体系的组织特点,认为城镇体系是一个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协同作用的非平衡开放系统。

2. 城镇体系的发展机制

顾朝林(1987)从中国早期城镇体系产生、机制分析、组织结构和基本特征起,按职能、等级规模、地域空间结构这三个基本方面探讨了秦汉以来至解放前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与演变。熵运动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已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城镇体系发展机制的重要方法。除了探讨一般的社会经济要素的动力作用外,不少学者着重从划分城镇体系的形成演化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极核发展阶段、集聚—扩散阶段、高水平网络化阶段(陈田,1992)来研究体系的发育和运行机制。

3. 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

这是中国学者着重研究并且成果颇丰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初结合对国外城镇体系发展研究的理解,以及对城镇体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南京大学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三大结构”的思想,即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组合结构”和“地域空间结构”,其后又提出了“网络系统结构”。相关的诸多工作使得城镇体系组织结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杨吾扬(1985)提出了新的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数量模式,揭示了城镇数量与等级的负相关及城镇人口规模与等级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城镇体系是一个等级序列。许学强(1982)应用哲夫公式对我国100多个大城市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城市规模是呈大小序列分布,且序列与城市人口规模间的非线性相关结论。丁金宏(1988)、顾朝林(1990)等人先后应用这一模型对2000年我国城市的规模结构进行了预测。

宋家泰(1988)等人将我国城镇职能体系划分为:政治中心体系、交通中心体系、工矿业城镇体系、旅游中心城镇体系等几种类型。张文奎(1990)等人依据尼尔逊求标准差原理,并结合哈里斯定界线值方法,对全国城市进行了研究,将城市划分为9种类型。周一星(1988)、田文祝(1991)等人运用聚类分析和尼尔逊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将中国城市按工业职能分为4个大类、18个亚类和43个职能组。近年来

亦有一些学者(宁越敏, 1991; 庞效民, 1996; 顾朝林, 1997; 黄富厢, 1997)等研究了世界城市体系对中国的影响, 对新国际经济背景下的这些城市职能作了重新理解与界定, 基本认为: 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将是中国介入世界城市体系的节点城市。

顾朝林(1986)综合探讨了城镇体系的组织结构模式, 划分了集中、集中一分散、分散三种类型的城市地域空间结构; 弱核体系、单核体系、单心多核体系、多核体系和强核体系五类等级规模结构; 矿产资源型、农业型和加工工业型三类职能组合结构; 以及城镇工业经济、城镇间运输网络、区域间商品流通网络及城镇网络等四类网络系统, 并于1992年出版了《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

4. 城镇影响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学者开始了对城镇间相互作用的各种流(人流、物流、金融流、信息流)的研究, 对于城市间的引力作用也开展了研究, 重力模型、断裂点公式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 并对我国的城市经济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划分。

5. 城镇体系基础理论

我国学术界在城镇体系的基础理论方面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总体来说, 还主要是对国外理论的引进介绍和实验应用。其中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验研究和应用方面较多, 用以研究城市商业区位, 解释历史上的城市分布规律, 分析城镇群、集镇群的分布特征, 以及进行城镇网的优化设计等, 但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心地理论的应用价值还有不同的看法。在增长极理论的基础上, 我国学者(陆大道)还提出了城镇体系的点轴空间发展结构。

6. 城镇体系规划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对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方法作了初步总结, 将规划内容归纳为“三结构一网络”, 并概括其基本程序为五个主要步骤(历史、现状和条件分析—趋势预测—指导思想拟定—组织结构规划—方案评估), 成为延续至今的城镇体系规划的主导理论与方法。针对新的社会经济背景, 顾朝林(1997)发表了《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一文, 作为发展与补充。

7. 区域性研究

由于实践的需要和我国区域类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我国城镇体系在区域研究领域之大、类型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目前全国已经普遍编制了各级行政区的城镇体系规划,并且正以经济区为单位进行了跨行政区的城镇体系研究与规划工作,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所着重于京津塘地区,北京大学着重于辽中南地区,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地理所等着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山大学着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随着边境的开放发展,近年来对跨境城镇体系的研究工作也已展开,对各类专业型区域的规划工作也极为普遍。

8. 城镇群体及都市圈发展研究

随着 1957 年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 (J. Gottmann) 对大城市带 (Megalopolis) 的开创性研究,城镇密集、群体连绵发展的现象已在世界范围内普及而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学术界一致认为我国正在形成发育中的比较明确的都市连绵区主要有: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塘地区和辽中南地区等。对于这些地区城镇体系的研究,近年也日见活跃。199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的机制和调控研究”列为重点课题。目前学术界对城镇群体发展现象的价值判断尚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研究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 (主要是城市地理界与规划建筑学界之间)。

随着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加速成长,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种形式的都市、大都市圈正在我国许多地区形成。都市圈这一地域空间形态的出现,为城镇体系规划研究与实践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也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江苏省这一方面的工作已经率先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纵观我国城镇体系研究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一些应用理论与方法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定量分析等方面还较薄弱,整个理论方法尚处在继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我国将城镇体系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从世界范围来讲亦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与成功,已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较为系统的规划方法和体系,对区域发展、城市规划、市镇设置、经济与行政区划等起着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并且已列入法定的规划编制程序。但我国城镇体系研究也表现出方法陈旧、僵化,观念难以适应经济政治体制转变,研究领域狭窄及与国际最新研究脱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